



【故地往事】

冯骥才与《挑山工》

□胡立东

冯骥才先生是我国著名作家、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他成为泰安市的荣誉市民，得益于他的散文《挑山工》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那是1999年年底，我到泰安市文化局任职，得知市里有关部门正在筹备荣誉市民的任命工作，便找到了泰安市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邹沁园先生。邹沁园先生是泰安出名的热心人和社会活动家。我把欲将冯骥才先生申报为荣誉市民的想法谈了之后，得到他的热情支持。不过据他讲，当时审批下来的荣誉市民，都是对泰安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外人士，国内及文化艺术方面还没有先例。于是，我便将在泰安市旅游局工作时到北京、天津、河南、陕西等地现场抽样调查泰山客源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。抽样调查其中一项是：“你知道泰山吗？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的泰山？”得到的回答中，超过一半是学生时代从课本上的《挑山工》知道的。

《挑山工》是冯骥才先生1981年创作的泰山见闻式散文。冯骥才先生在此文中没有着墨于泰山的名胜古迹和优美风光，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挑货上山的挑山工身上，精心描绘了挑山工艰辛的劳作和坚韧的毅力。赞扬了挑山工坚韧不拔的攀登精神。文章还通过挑山工的对话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：干什么事，只要一心向着既定目标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地前行，就能到达目的地。

《挑山工》自1983年先后入选全国中小学课本，每年都有一两千万学生品读，截至1999年，累计超过2亿多人次。冯骥才先生让数亿人从听说泰山，到走进泰山，从而了解到泰山有一群靠肩膀扛起输送物资重任的挑山工，品味了他们坚韧不拔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冯骥才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，是不能用经济数字来衡量的。

没过几天，邹沁园先生便将《泰安市荣誉市民申报表》送了过来，他说已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，均表示赞成。于是，便以泰安市文化局的名义开始了申报程序。申报工作很是顺利，2000年3月便审批了下来，我们联系上了冯骥才先生，从而促成了冯骥才先生的泰安之行。

冯先生一米九多的个子，仪表堂堂。他说与山东有缘，他的母亲是济宁人，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。我和有关人员陪同冯先生游览了岱庙，岱庙天贶殿里的壁画《泰山神启跸回銮图》深深吸引着他，连续两天他都到壁画前久久凝望，依依不舍。

好在先生下榻的御座宾馆与岱庙只一墙之隔。陪先生徒步攀登中天门时，在三官庙遇到一名肩负重荷的挑山工，先生趁挑山工休息之际，与之亲切交谈，问寒问暖，关怀备至；在回马岭挥汗如雨、气喘吁吁之时，几位游人认出了先生，兴高采烈地要求与先生合影留念，先生一一答应。先生谦和、真挚、低调的风格，留给我很深的印象。

在欢迎宴会上，冯先生说这是他第四次登泰山了，第一次是为了写生绘画。当时就被泰山岩石的苍劲雄浑以及刀刻斧砍的肌理所震撼。泰山的大气便注入了他胸中的丘壑。《挑山工》就是他第一次登泰山后的切身感受。随即他创作了

一幅画——在陡直而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，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，被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，却一步步、不声不响、坚韧地向上攀登。

第二次登泰山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山敬香拜神的老婆婆。当时山上山下的寺庙道观都大门紧锁，门楣上落满了蜘蛛网。然而那些虔诚的信徒为了还愿（也许是许愿），千辛万苦地爬上山顶，隔门磕头，至诚至真，令人感动，他从中得到启示，世上最难约束的，乃是人心。

第三次登泰山，是他的父亲去世之后，他的母亲终日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。为了让母亲振作起来，他陪母亲来登泰山。他搀扶着母亲，乘汽车，坐缆车登上了泰山极顶，买了一个“登泰山，小天下”纪念章，给母亲戴在胸前，并在玉皇顶刻有“极顶”两个字的石头前为母亲照了一张相。返回之后，母亲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心情豁然开朗。冯先生感慨万分，泰山啊，这就是你神奇的魅力所在。

冯先生说，我和泰山有缘，泰山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示，青年时代，是泰山挑山工给了我巨大的激励，鼓舞我奋斗不止。如今，在生命的秋天，我要认真“盘点”自己，走好未来的路程。

冯先生说，此生曾经登过不止数百座山，但是感受最深的当数泰山。他深信，一个人能与一座堪称国山的名山如此结缘，是一种少有的福分。很多山都有“挑山工”，但是只能叫“挑夫”，只有泰山上称他们为“挑山工”。他觉得“挑山”这个词很有寓意，很有意境，总让人隐隐地感到一种不怕吃苦，坚韧不拔的精神。他说，在他的书房里，保存着一根光滑、包浆的扁担，是一个泰山挑山工送给他的，他一直视若珍宝。冯先生说，它不仅是一个生活的遗物，它更是一个苍劲而又珍贵的历史生命，它是永恒的。

第一次登泰山之后，冯先生便依据他的切身感受创作了一幅画，名曰《泰山挑山工图》，一直把它挂在书桌前不肯换掉。但是这幅心爱的画作在一次地震中不幸被毁，冯先生又重新画了一幅，并在多次画展上亮相，许多收藏家想得到它，但冯先生始终不肯出手。为了表达对泰山的深情，冯先生把这幅珍藏多年的《泰山挑山工图》带到了泰安，他说，这幅画应该属于我的城市。

一篇散文在少年儿童中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。冯先生因此被泰安市实验学校聘请为少先队名誉辅导员。在受聘仪式上，冯先生为孩子们写下了四个大字——“爱我泰山”。

在泰山脚下的御座宾馆举行的泰安市荣誉市民颁证仪式上，冯先生深情地说，《挑山工》这篇散文不过是写出了我对泰山的感受，谈不上为泰山增添光彩，可泰山却给了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我的创作生涯中，有一种精神，一种力量，就是与挑山工连在一起的。他已经注入了我的骨髓，我要永远地把它保留下来。

时任泰安市委书记的莫振奎同志将一把象征“可以开启泰山大门”的金钥匙交到冯骥才先生手中。冯骥才先生将他的画作《泰山挑山工图》献给了泰安市，如今已作为镇馆之宝，永久地珍藏于泰安市美术馆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、泰安市作协名誉主席）

□孙南邨

清代官吏、诗人李光庭所著《乡言解颐》对山东馒头、馍馍赞誉有加，其《四馍馍歌》由馍馍说到麦子，有“山左来牟甲天下”之句。

《乡言解颐》有两处说到山东面食，一处是《新年十事·馒头》：“腊月望后，便蒸馒头，分有馅、无馅二种。有细作者，拣麦磨面，煞费功夫，乡人有‘磨面先洗驴’之谓。卖面者曰‘重罗’，家作至于四罗。拽冰糖以模印之，其白如雪，面有银光，谓之‘白包子’。近日，京师山左人家作者最精。昔年家乡亦有能作者，今失传矣。”

文中的“山左”即山东，“罗”是磨面后用以罗面的工具，罗有粗细之分，“重罗”“四罗”是说用不同的罗来罗面的次数。《乡言解颐》说，当时馒头分有馅、无馅两种。

那么，“京师山左人家作者最精”的馒头是哪一种？从文中来看，此馒头虽又名“白包子”，实则与今天所说的“花馒头”，并非肉、菜馅类的包子。山东胶东一带至今仍流行蒸制这种花馒头，亦称“花饽饽”。

《乡言解颐》另一处说到山东面食，是在《食物十事·馍》：“东哲《饼赋》：‘馒头薄持。’饼亦谓之馒头。家乡则烙饼谓之饼，蒸馒头谓之包子。若河南、山左则同谓之馍。‘蔚侄’来自‘著侄’昌邑任所，言其每食必一人四馍，因作《四馍馍歌》……”

饼谓之馒头，馒头谓之包子，馍、馍馍亦谓之馒头，这是不同地区对某种面食的乡俗称，有言“三里不同俗”，此事很正常。李光庭说河南、山东把馒头“同谓之馍”，这是听其“蔚侄”所言，或许那时山东昌邑一带就是如此称呼。

用山东中部方言写成的明末清初世情小说《醒世姻缘传》，多次说到“馍馍”和“饼”，也说到“馒头”，还说到饼又有“烙饼”“单饼”“油饼”之类，既无相混之处，也无一处叫馍馍为“馍”。我的家乡鲁南地区对这几类面食也是这样称呼。

去年秋末，我蹬车由陕西经河南到山东，一路走来，得知微山湖以西至豫陕许多地方，把馍馍或饼简称为“馍”。

《四馍馍歌》又见于李光庭《虚受斋诗钞》，与《食物十事·馍》诗相同：“吃不吃，四馍馍。饱不少，饥不多。山左来牟甲天下，得四时气性平和。家家蒸馍养丁口，旅馆人众难盈科。数纪之会有节，八馍两食无差讹……千粮以愆民失德，无四馍馍将奈何？吃不吃，四馍馍。”

近购此书得知，李光庭（1773年-1860年）字撝扬，号朴园，别号瓮斋老人，顺天府宝坻县林亭口（今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）人，乾隆六十年举人，历任内阁中书、湖北黄州知府，去世后

晋封光禄大夫。据史料记载：“林亭口镇李氏家族就是宝坻著名的耕读世家、科举世家……自清乾隆五十四年至光绪三十年的百余年间，李家子弟共出了十位进士，二十多位举人，七十多人成为不同级别的官员。”

李光庭家族出来的官员中，就有人在山东任职。《乡言解颐》说：“‘蔚侄’来自‘著侄’昌邑任所”。《虚受斋诗钞》有《送著侄试令山左》诗，诗注“‘蔚侄’去冬先已至彼”，其侄当是山东昌邑县令，“蔚侄”已先“著侄”一年到山东，不知任职于何地，清未地方志当有记载。

《四馍馍歌》题后注“演‘蔚侄’语”，应当是“蔚侄”回家后，说到他们随从职员在昌邑的伙食，每天两顿饭，每顿四个馍，饭食少有变化，已经吃够了。

李光庭听后不以为然，于是教育“蔚侄”：山东的麦子自古有名，你作为一个随从人员，每天有八个馍馍吃，怎么还不知足呢？并且作诗：“吃不吃，四馍馍。饱不少，饥不多。”开头这两句是重复“蔚侄”的口语，末句是李光庭来回怼他的，读来颇有趣味。

清末，山东烧饼在南京也很有名。周作人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引用汪仲贤先生的话，说在南京求学时“早晨吃了两碗稀饭，到十点下课，往往肚里饿得咕咕叫，叫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，一个铜元麻油辣酱和醋，拿烧饼蘸着吃，吃得又香又辣，又酸又点饥，真比山珍海味还鲜”。周作人回忆说：“这是两块约三寸见方的烧饼连在一起，中间勒上一刀，拗开就是两块……其味道厚实非北京所能及，使我至今未能忘记。”此处说的山东烧饼，略似于现在鲁南的一种面食缸贴。

李光庭学识渊博，行文很有风趣。他说“山左来牟甲天下，得四时气性平和”。农业专家唐启宇博士在《中国作物栽培史稿》中说：“甲骨文有‘来’字和‘麦’字，‘来’字和‘麦’字都专指小麦而言；‘牟’字在《诗经》中专指大麦而言，当时都是秋种夏熟的作物。”

近人考证小麦、大麦为“来牟”（今济南市莱芜区）所出产，蔓延于济水流域，而后及于中原，达于西北，周始有之，来牟本为东夷之特产。从中可知小麦、大麦在我国的原产地是山东半岛。西汉时，仍有“济水通而宜麦”（《淮南子·坠形训》）之说。明代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说：“凡北方小麦历四时之气，自秋播种，明年初夏方收。”可见李光庭诗句皆有出处。

先秦时期齐鲁大地曾有莱国、牟国，后来用莱、牟指代小麦、大麦，历史之久、传播之广，被李光庭称为“甲天下”实不为过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）

【史海钩沉】清代官吏笔下的山东面食